

格致学术译丛

历史主义

[意]卡洛·安东尼 著
黄艳红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历史主义

[意]卡洛·安东尼 著
黄艳红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主义/(意)安东尼(Antoni,C)著;黄艳红
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格致学术译丛)
ISBN 978-7-5432-1783-6

I. ①历... II. ①安...②黄... III. ①历史主义—研
究 IV. ①K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1049 号

责任编辑 高 璇
封面装帧 陈 楠

格致学术译丛

历史主义

[意]卡洛·安东尼 著
黄艳红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格致出版社
www.ewen.cc www.hibooks.cn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格致出版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9.5
插 页 2
字 数 126,000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1783-6/K · 180
定 价 20.00 元

总 序

古老而智慧的中国曾经创造了辉煌绚烂的文化,先秦诸子百家异彩纷呈的思想学说,基本界定了此后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并且演生为内在的精神价值,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规约着这片土地上亿万斯民的心灵世界。然而,近代中西文明碰撞交汇,以及斯时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情境,不仅让我们对那些来自海洋异质文明的了解成为当务之急,而且在这种了解背后更承载着文化和现实的双重使命。自晚清第一批试图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开始译介西方学术文化,形成中国西学译介涓涓细流,递及民国时代新学人的大力引进而渐成滔滔之势。他们内心孜孜以求的不仅仅是文化意义上的习知,更希图通过对西学的了解,滋养和更生己国之国民精神,以实现近代中国求富求强的急切历史诉求。

时至今日,中国致力社会现代化的努力和全球趋于一体化并肩而行。尽管历史的情境迥异于往昔,但中国寻求精神补益和国家富强的基调鸣响依旧。在此种情形下,一方面是世界各国思想文化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另一方面是中国仍然渴盼汲取外来文化之精华,以图将之融入我们深邃的传统,为我们的文化智慧添加新的因子,进而萌发生长为深蕴人文气息、批判却宽容、自由与创造的思维方式。惟如此,中国的学术文化才会不断提升,中国的精神品格才会历久弥新,中国的现代化才有最为坚实长久的支撑。

正是基于这样的期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不辞辛劳地引介国外学术著作,对推动中国社会思想的进步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均起了不容否认的作用。尤其世纪之交以来,随着中国出版界的开放和繁荣,引进和翻译西方优秀学术著作更呈光大之势。

此等情形,实际上是中国知识界百余年来一以贯之的超越梦想的潜在表达——吸纳外来文化之精粹,实现自我之超越,进而达至民强而国富的梦想。一如中国经典所言:“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本社欲倾力推出“格致学术译丛”,其宗旨亦在于此。

我们期待能以“格致学术译丛”作为一个小小的平台,加入到当下中国方兴未艾的西学引介潮流中,为我们时代的知识积累和文化精神建设添砖加瓦。热切地期盼能够得到学术界同仁的关注和支持,让我们联手组构为共同体,以一种从容的心态,不图急切的事功,不事抽象的宏论,更不奢望一夜之间即能塑造出什么全新的美好物事。我们只须埋首做自己应做的事,尽自己应尽的责,相信必有和风化雨之日。

陈 恒

法文版序

Historismus, storicismo 这两个词在德语和意大利语中已经很常用了。在法语中, *historisme* 一词几乎不为人知,《小拉鲁斯辞典》中查不到这个词。只有在拉朗德(Lalande)的《哲学辞典》中才能找到它。然而,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这个词所蕴含的观念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世界是必不可少的。

历史主义(*historisme*)不喜欢人们把它定义为关于历史的哲学。它是等同于历史的哲学(*philosophie identifiée à l'histoire*)——“在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正如本尼迪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言。它指的是一种许多学说都共有的哲学立场,即使这些学说差异很大,如马克思主义者和克罗齐主义者都是历史主义者,但他们同时又是不可调和的对手。

这种哲学立场曾催生并仍在催生很多伟大的历史著作;它既孕育了政治学说——若不借助于历史主义,怎能解释自由主义?——也孕育了美学理论,简言之,它是一种人生态度。比如,如果不懂得历史主义,M. 茹尔丹(M. Jourdain)等人怎能说是“历史主义造就的”呢?的确,这些人的立场多样,思想各异,生活的时代也不同,他们并不总是能意识到那种有时很细小的联系纽带。但这一联系确实存在;19世纪末一些伟大的

目 录

法文版序

001 一 历史主义:术语的含义和历史

013 二 历史主义的英国先驱

025 三 自由历史主义

037 四 人文历史主义

048 五 民族的神话

060 六 浪漫历史主义

072 七 辩证历史主义

090 八 19 世纪的历史学

119 九 唯物历史主义

131 十 绝对历史主义

146 译后记

一 历史主义：术语的含义和历史

“历史主义”(historisme)一词独特而曲折的历程至今还没有走到尽头。这个词先后有过各种意义：最初它指的是一种错误，甚至某种反常，后来它被定义为一种积极的思想成就。自此，这一新的含义不断扩展，以致囊括了现代思想中各种最不相同、最互相矛盾的思潮。有人甚至认为，这个术语表达的立场并不仅限于它自己所处的时代：历史主义早在人们这样称呼它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今天，很多最不可能成为“历史主义者”(historiste)的思想家也被称为历史主义者。于是，当人们追溯历史主义的源头时，会从19世纪上溯到18世纪；而确切地说，有人觉得在18世纪是找不到源头的。今天，有人大概会追溯得更远，一直到17世纪末。是否应该追溯得更远、是否该把历史主义视为人类思想中的一个常量，就像神秘主义或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e)一样呢？

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历史主义的危机”才开始传播，仿佛只有当它意味着文明价值观的重大震荡时，人们才最终意识到它的性质和影响，并觉察到我们全部的文化都受“历史主义”的浸透，而这种历史主义可能摧毁对我们的文明来说至关重要的思想和信仰遗产——从形而上学到神学再到自然法。当然，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当下的世界轮廓显得更加清晰，因为它必须面对的那些可怕难题更为醒目。因此，历史主义问题——不仅牵涉理论价值，还有道德和政治价

值——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重大难题，如果不是唯一的难题的话；而对它的研究则是对我们当代文明的良知的考察。

19 世纪末，“历史主义”第一次出现在德国，其意义便是意大利人今天赋予这个词的意义，说来这真是件有趣的事。1879 年，哲学史家卡尔·维尔纳（Karl Werner）在他关于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的论著中^①使用了这个术语，它指的是这样一种哲学的独特性：人类的思想不能认识任何历史之外的实在，因为人类思想构成的就是历史。

但这种含义没有马上得到普遍的认可。不久，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追随者们的笔下，这个术语再次出现，但这一次是贬义的法：它旨在谴责被称为“历史的”（historique）德国学派的论点。奥地利人门格尔（Menger）^②指责说，他们的对手企图将经济及经济法则归结为与历史相关的简单现象，这些现象依赖于特定的环境，它们没有任何规范性价值，而这种企图就是历史主义。

20 世纪初，我们再次碰到了这个术语，但仍然是贬义的：它出现在德国新教神学家们的著作中，他们的对手利齐尔（Ritschl）^③学派将历史批判方法运用到基督教起源和教义形成的研究中。新教神学家们谴责这类方法存在有害之处，因为它倾向于把基督教及其教义降格为某种人类历史事实。

宗教启示论（Révélation）的捍卫者们把这种倾向定义为“历史主义的”（historiste）。不过，几乎在这一倾向受到谴责的同时，天主教会却认为它是“现代主义的”（moderniste），它对关于基督教真理的超自然起源之信仰而言是危险的。

这一次，历史主义一词开始真正成为习惯性的用法。确实，这场超出神学院系的论战预示着路德教内部的一场大震荡。事实上，历史主义

① 卡尔·维尔纳（1821—1888），奥地利神学家，这部著作题为《作为哲学家和学术研究者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 als Philosoph et Gelehrter Forscher*）。

② “Erreurs de l'historisme dans l'économie politique allemande”，这篇文章抨击的是德国学派的首领施默勒（Schmoller）的论点。——法文译者注

③ 利齐尔（Albrecht Ritschl，1822—1889），德国神学家。

的酵母正是在这些神学院系中，在这些没有真正的教阶制的教义的捍卫者和阐释者们中间酝酿出来的。最后，威廉二世(Guillaume II)，这位路德教的主教和首脑及普鲁士的国王，觉得自己应该介入论战。但是，由于历史批判及其学术机构是德国文化中理所当然的骄傲，它们享有巨大的权威，要对这场争论进行评判就更困难了。

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为严肃认真的探讨。作为神学教授和教会史专家的特勒尔奇怀有深刻的宗教意识，他因生活在信仰与科学之间而感到痛苦。他谴责“纯粹历史主义”(historisme pur)，因为它把拯救的教义简化为纯粹的历史事实，但他无法平息这一冲突，不能达成某种妥协，也不能确定合理的、不会危及信仰的历史主义的界限。他死后出版的《被克服的历史主义》(*Historisme Surmonté*)所表达的几乎只是一种焦虑、一种期待，根本没有克服历史主义。不过，特勒尔奇在历史主义的探讨中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因为他使这个问题超越了神学争论的范围，将它置于整个现代文化的背景之上。在1922年出版的《历史主义及其问题》(*L'historisme et ses Problèmes*)中，他指出，历史主义是整个现代思想的特征，但也谈到了“历史主义的危机”(crise de l'historisme)。他认为，历史主义的立场不仅从根本上伤害了基督教教义，也伤害了我们文明的原则和价值观。如果我们的文明成为历史主义文明的话，那么它已经在侵蚀自己的根基。由于文明的整个大厦失去了绝对性质，它看起来像是建筑在历史相对论的流沙之上，到头来它只能迷失方向，走向混乱和瓦解。世俗生活的规范、道德生活的准则，都只是历史的产物，它们都将丧失一切声誉和威望。

但是，历史学也是从各种普遍性概念进行历史推论的，因而它同样需要接受自己独特标准的检验。历史主义运动落入了自己设定的陷阱中，它走向了虚无。事实上，当时的德国思想正处在发现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e)的关节点上，而存在主义最终消灭了历史价值，也许它可以被视为一种关于虚无的哲学；不过，存在主义同样试图突出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些条件应外在于任何历史性的考虑——即一种存在(l'être)

的新本源(principe),并试图在这一基本条件中找到新形而上学的各种前提。而路德教则试图拯救其信仰;它激烈地抨击新教自由主义者的历史主义——或者说抨击两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批判——它对现代主义毫不妥协,并勇敢地革新圣保罗关于启示和恩典的观念。卡尔·巴特(Karl Barth)^①和埃米尔·布鲁纳(Emil Brunner)是这场被称为“危机神学”(théologie de la crise)运动的领袖,他们开始把历史主义这一术语当作一个抨击性的用语。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特勒尔奇已经在历史主义中看到了19世纪以来现代思想中的支配性特征。他的朋友、政治史家和德国民族自由派史学的最后一个伟大代表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则指出,19世纪的德国历史主义固然孕育了德国的民族观念和民族国家,但它也潜藏着政治现实主义,俾斯麦(Bismarck)曾实践过这种现实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在与协约国的思想斗争中也运用了它。

战败后的德国通过迈内克再次确认了自己独特原则的价值。“历史主义”从此失去了所有贬损的含义,转而指一场伟大的精神运动、一种人类思想的积极成就。迈内克在他的《国家理由观念》(*L'idée de la raison d'Etat*)中已经证明,直言不讳、冷酷无情的政治现实主义不是德国的发明,它起源于拉丁世界,是马基雅维利(Machiavel)和意大利的国家理论学者们的创造,它在很晚的时候才几乎是强行地进入德国思想中;在这部著作中,迈内克把历史主义定义为对人类事物及其演变过程中的个体性(individualité)的意识。他认为,这种关于变化性和多样性的价值及其合理性的意识,其源头在18世纪,正如他在《历史主义的兴起》中指出的那样。

于是这个术语获得了明晰而准确的意义:历史主义就是由德国思想所实现的与西方自然法传统的决裂。

① 卡尔·巴特(1886—1968),瑞士新教神学家,被教皇庇护十二(Pius XII)视为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以来最重要的神学家;埃米尔·布鲁纳(1889—1966),瑞士新教神学家,卡尔·巴特的朋友和同事。

我们说过，迈内克是俾斯麦主义史学家们杰出的继承人，这些史学家曾在19世纪追随那位德意志帝国的奠基者，完成了从自由主义到权势政治(*politique de puissance*)的演变——这种权势政治虽然没有什么顾忌，但它是成功的。在他年轻时候的一部著作中，迈内克曾描述过德国思想从18世纪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isme*)向民族国家观念的演变。

但是，如果对他所推崇的观念作深入考察的话，便会发现它与我们在马志尼(Mazzini)^①和加富尔(Cavour)^②那里看到的民族观念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对于马志尼和加富尔，民族观念并不意味着对普遍人类观念的否定；相反，这种观念希望通过某个自由民族的历史性构建而完全实现人道主义。作为世界公民的情感依然在这些爱国者的心灵中跳动；加里波第(Garibaldi)^③在追求自己祖国的自由时，同样也承认所有祖国的自由权利。

迈内克描述和颂扬的观念，是一种不可化约的(*irréductible*)民族个体特性，它的生存准则在于民族自身，超越任何普遍性法则。显而易见的是，这里他把莱布尼茨(Leibnitz)^④的个体论观念运用到了民族观念中：封闭的单子(*monade*)不与外界接触而自行发展其内在独特本性。同样的个体性观念也体现在德国的浪漫主义者身上。显然，强权伦理便是从这种民族个体性至高无上的观念中发展而来的。德意志民族在构建民族国家时不服从某种人类自由的普遍原则，毋宁是以强力确认其独特本性的价值，并让世界接受之。

在《基督教团体和教会的社会信条》(*Les doctrines sociales des Eglises et des groupes chrétiens*)中，特勒尔奇已经指出自然法传统在西方文明史上的决定性意义，而对于拉丁和盎格鲁—撒克逊各民族的历史

① 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 1805—1872)，意大利爱国者、哲学家、共济会成员、政治家，曾积极推动意大利统一运动。

② 加富尔(1810—1861)，意大利政治家，在担任皮埃蒙特—撒丁尼亚王国首相期间曾领导意大利统一运动。

③ 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中的军事和政治领袖。

④ 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哲学家。

而言尤其如此。在古代各共和国崩溃、自由也随之消逝之时，斯多噶主义者(stoïciens)设想出一种关于人类共同本性和普遍理性的观念，普遍的自然法便来源于此，这种自然法高于不同民族的制度，高于强力和权势；立法从此只须服从这一永恒的准则。这一观念被罗马的哲学家和法学家们继承，并体现在拉丁教父的著作中和天主教的教义中。但希腊教父将自然法观念拒之门外，拜占庭文明和更具神秘与苦修色彩的东方基督教因而也排斥了自然法。路德(Luther)也是个神秘主义者，对世界的看法也更悲观，他同样拒绝可在尘世实现的理性法(loi rationnelle)的思想，但加尔文主义和盎格鲁—撒克逊各新教派别则以真正的传道热忱接受了理性法的原则。

到17世纪，这一思想以自然法(droit naturel)的形态再次出现，并且成为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原则。在迈内克看来，德国历史主义摧毁的正是这种作为现代世界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理想之基础的观念。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这种普遍理性曾是西方文明的北斗星，但在迈内克看来，它无非是个抽象、空洞而且虚伪的观念，他认为，摧毁这一观念是自宗教改革以来德国思想取得的第二个伟大成就。概而言之，德国历史主义用个体化的具体思维取代了一概而论的抽象思维。18世纪的世界主义者徒劳地谈论人类，而德国历史主义则认为民族是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它有自己的灵魂(âme)、自己的精神(esprit)，以及自己独特的历史。

这种历史多样性的视角必然衍生出政治现实主义，因为整个民族个体必然要求毫无顾忌地实现排他性的自身利益。

维柯和18世纪的一些作家已经为这种历史主义开了先河，但唯有德国思想使其臻于完善；对于迈内克，历史主义是人类思想在对历史事务的认识上达到的最高境界。不过应该补充的是，迈内克像莱布尼茨那样，也梦想有一种超越民族个体差异的高级和谐(harmonie supérieure)，而莱布尼茨曾设想单子多元性之上的某种先定和谐(harmonie pré-établie)；迈内克在歌德(Goethe)和历史学家兰克(Ranke)身上发现了在

多样性中把握统一性的才智。进一步说，历史主义在这两位作者那里达到了最高级、最精致的阶段，此后它就只能走向衰落了。

迈内克试图以此来协调民族主义和关于普遍人性的朦胧情感；他试图避免这一了不起的德国历史主义的终极推论；但在 19 世纪，德国那些权势国家的理论家们已经走向了极端，与迈内克同时代的纳粹理论家们同样如此。他的尝试劳而无功，几乎可以说是天真幼稚的。

迈内克自认为从德国历史主义中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但实际上，他指出的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这个错误对我们的命运造成了可怕的后果。他的定义的优点是让我们十分清晰地理解了支配 18 世纪末直至今日的德国以及欧洲精神史和政治史的一大主题。这个定义比其他任何理论都更加清晰地使我们意识到，欧洲文明在德国思想的影响下抛弃自然法传统后所失去的东西。

否认人类普遍价值的存在，将这些价值定义为抽象的东西，讥讽它们是天真甚至虚伪之物，并以封闭的个体性价值取而代之，这个错误是悲剧性的。在私人生活中，这导致了浪漫派混乱的个人主义，并很快走向对怪诞人格的崇拜。当这种观念运用到民族问题上时，其后果更为不幸。民族意识从此把民族周围的世界视为对其独特本质的永恒威胁；民族的存在不再与人类的共同生活和合作发生关系，民族生存始终处于敌对状态。这样一来，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准则便成为战争，而这正是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①和特赖奇克(Treitschke)^②所教导的。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民族观念——最初是关于自由的观念——是如何在 19 世纪发生转变、并落入一种粗糙的民族主义的。

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历史主义最终不会把历史当回事，它甚至是反历史的。实际上，我们在德国历史主义的源头中能发现关于民族的浪漫主义观念，正如赫尔德(Herder)所表述的那样：民族是近乎生

① 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军事史家和军事理论家。

② 特赖奇克(1834—1896)，德国民族主义史学家和政论家。

物性质的自然个体,它具有内在的、幽暗的、非理性的灵魂,这一灵魂通过语言、习惯、民歌和神话表现出来。中欧和东欧盛行的正是这种看起来天真无邪的诗意观念,也正是在这些地区,特点并不鲜明的民族在努力寻找其独特个性的表现证据和存在理由。

于是,这一观念在德意志民族中激发起各种思潮,这些思潮试图在遥远野蛮的史前时代寻找能避免所有腐败的要素,寻找独特而纯粹的本质,并企图把历史带给民族的一切东西斥责为变质。

根据迈内克的看法,德国历史主义也是历史智慧的最高形态。我们不能否认,迈内克本人是位极为敏锐的史学家,他特别擅长解释各种事件。本尼迪托·克罗齐也认为,我们从他的分析中受益甚多。但我们也不能忘记,被他视为历史主义之轴心的歌德和兰克,一个是普世人道主义的诗人,一个是欧洲史专家。因为兰克并不完全专注于德国史,他同样关注教皇史、拉丁和条顿民族史、法国史和英国史;而在他那个时代,即19世纪,当所有历史学都几乎完全献身于民族历史时,兰克却致力于研究某种普遍历史。

但是,如果我们从明确的方法论角度来考察迈内克推崇的历史主义,我们必然会意识到,这种历史主义并不能保障真正的历史知识的获得,因为从严格的逻辑来说,这种历史主义会导致对普遍价值的否认,因而也就导致对人类思想本质的否认。

对自然法、世界主义和抽象的人道主义的攻击,对启蒙时代哲学家们的人类之爱的诘难,都可能损害基督教的基础。最终,如果认为个别事物中不存在人类精神的普遍性质的积极作用的话,便不可能对具体的个别事物——如个人、民族、国家和文明——及其变迁形成和成败得失作出历史判断。

迈内克的历史主义表现为一种多元主义,但他的多元主义在强调差异性时粉碎了统一性。这是一种关于孤立的个体的多元性,是外在于历史和历史认识的相互分离的实体的多元性。只要向前再迈一步,历史学就要让位于种族主义生物学了。

在法国和英国，历史主义这个术语还不为人知，它所包含的问题同样如此；在英国，唯一对此有意识的史学家是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这位天主教徒对现代主义问题深为关切，他还在德国从事过研究工作。

在德国之外，这个术语几经周折后终于在意大利确立起来，这也是绝无仅有的；但是它进入意大利是稍晚的事。我在雷纳托·塞拉(Renato Serra)1910年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过这个术语，他在文章中探讨的是卡尔杜齐(Carducci)^①的历史主义。这位罗马涅批评家^②显然想探讨卡尔杜齐史学中的史诗感，因为在当时，人们称呼卡尔杜齐为“史学诗人”。我在路易基·艾诺蒂(Luigi Einaudi)^③的文章中也曾看到过历史主义这一术语，这篇文章年代与塞拉的文章相同，它讲的是人们在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那里发现的现实主义具体感。最后，圭多·德·鲁杰罗(Guido De Ruggiero)^④在1924年发表的简明《意大利哲学史》(*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italienne*)中将詹巴蒂斯塔·维柯确定为意大利历史主义的奠基人。

我认为，真正把这个术语引入意大利的是阿德里亚诺·蒂尔格(Adriano Tilgher)^⑤，他在1920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19世纪的历史主义已经迅速走向衰落，而18世纪的反历史主义则开始复苏。

蒂尔格当时把历史主义定义为已经走向保守的革命资产阶级的历史—政治哲学；在实践领域，社会和政治改良主义更适合于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则是它的对立面。但是在1928年，蒂尔格改变了他的看法：在他看来，历史主义是19世纪所认识的历史学，即一场无名的集体运动；而在幸运的20世纪，与这种认识相对立的是历史的伟大创造者、历史事件的支配者、历史行动中的英雄。蒂尔格推崇天才的超人，他援引尼采(Nietzsche)的《不合时宜的思想》(*Considérations inactuelles*)。

① 卡尔杜齐(1835—1907)，意大利诗人和作家。

② 塞拉来自意大利罗马涅大区，故名。

③ 艾诺蒂(1874—1967)，意大利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任意大利总统。

④ 鲁杰罗(1888—1948)，意大利哲学史家和政治家。

⑤ 蒂尔格(1887—1941)，意大利哲学家。

elles),谴责那种作为贫乏颓废的阉人科学的历史学,认为这种科学扼杀了行动的冲动力(*élan de l'action*)。实际上,在当时,历史主义与反历史主义的对立与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对立是相互呼应的。蒂尔格称克罗齐的自由主义为历史主义的,他认为这种自由主义好似某种消极的认可、某种对既成事实的辩护、某种思维的惰性。

当时,法西斯政论家们将行动主义(*activiste*)论调变成了一种风行一时的说法。为了回应这些抨击,本尼迪托·克罗齐在1938年发表了著名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在1902年出版的《美学》(*Esthétique*)中,克罗齐曾使用过“istorismo”^①这一术语,用来指称从诗歌中强求历史真实的错误做法。1933年,在给K.霍伊斯(K. Heussi)^②的著作《历史主义的危机》(*La crise de l'historisme*)写的书评中,克罗齐将德语的Historismus翻译成istorismo,他赋予后一词的含义即霍伊斯所指的意义:关于历史的客观主义观念,它特别适合于19世纪末的实证主义和学术研究——这种观念认为有价值的只有“事实”(faits),而事实与历史学家的思想无涉。

但在1930年,克罗齐在牛津举办的一次讲座中采取了反对“反历史”(anti-historique)观点的立场,当时这种观点正在欧洲流传,而克罗齐宣称自己是“历史主义”(storicismo)的信徒,就是说,他服膺这样一种历史意识,通过这种意识,他可以感受到“与宇宙生命合而为一”,觉得自己是“那些曾对世界产生影响、并依然活在其创造成果之中的人们的兄弟、儿子和伙伴”。然而,当这篇讲稿在1935年重印时,他决定不保留这个术语,而是以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术语“历史性”(historicité, storicità)来取代之。

直到很晚的时候,克罗齐才决心接受“绝对历史主义”(historisme

① 一般而言,我们翻译的“历史主义”(historisme)在意大利语中的对应词是 storicismo。可以看到,istorismo 与该书中通常使用的这个对应词在词形上有点不同。——法文译者注

② 霍伊斯(1877—1961),德国历史学家。